



这是史诗蕴藏的大地

王久辛

对其创作成就的研究,尚处于浅表状态

在诗人郭小川一系列表达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史的长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非同一般的、超拔的追求和特质。他似乎有一种非常好的直觉与自觉,即只有执着于正史激流中,迎难而上敢碰硬、敢直面惨痛、敢挑战陌生,才能创造出符合人性又揭示历史必然逻辑的诗歌新境界。如郭小川在《白雪的赞歌》中写一个县委书记的妻子因为临产不能与丈夫一起赴前线,结果丈夫走后不久,就传来他先受俘、后被俘、再失踪的消息。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每件都像刀子刺心似的直入人心,尤其那一层层一重重的心理抒写,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可以说,郭小川从来都不是简单、外在地赞美人性的纯洁与忠贞,他特别善于在人的灵魂的“炙烤”之中,来展现人的高贵品质与动人力量。

再如长诗《深深的山谷》,他写革命队伍中

研究,至今处于浅表状态,其创作雄心推动下诞生的多部作品,尚未得到足够的解读与诠释。可以说,这既是我们这些诗人的浅薄,也是诗学研究者的缺位。

郭小川留下的这份遗产,我们承继得太少

在我看来,诗人郭小川在他们那一代诗人中,是一只洞悉与掌握了对历史的审美创作的“稀世之鸟”。

他写的另一部长诗《将军三部曲》,可以说其价值至今都没有被充分认识和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写“将军”,而不是基层官兵?在“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当时语境下,他大胆选择“将军”作为审美的创作对象,而且是一著就是“三部曲”的作品模式,是有着良苦用心的。诗人郭小川生前(1960年),曾这样表露过:“我已着手做了不少准备,打算从明年起继续写《将军三部曲》的续篇,一直写下去,也许要写十几篇像《月下》这样的东西。”并补充说,“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想了,好好写这篇东西,献给我们人民吧。”

郭小川为什么会誓愿终生要写这部长诗呢?我在反复诵读中体会,从已写出的《将军三部曲》来看,他有决心表现中国现代史上两次伟大的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瞄准了“将军”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即上可直接领会领袖的战略意图,下可率领基层官兵投入战斗。事实上,正是因为诗人艺术地择取了“将军”这个诗歌里的人物身份,才能更好地用诗歌作品来书写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

第一曲《月下》,他写将军4天4夜部署大战役的气度与河边月下的漫步,其运筹帷幄决战前的精神状态,和月下心灵与天地之间的情感交流,今天读来,仍令人强烈感受到人民军队高级将领的热血、智性、质感、浪漫。他所书写的“将军”,真是血肉灵魂俱足,精神风范可感。第二曲《雾中》,正面写战斗和战情突变,还写到了警卫员的牺牲,下线面一应俱全,诗的腾挪跳跃,自如贯通。尤其对警卫员牺牲及之后的默默追思,呈现了大历史中细枝末梢的感人至深。第三曲《风前》,写大战关键时刻,将军奉令调离,部队却在无“帅”统领的情况下,按既定目标进军并出色完成战斗任务。我们知道,这种临时调动在战争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诗人却由此而展开创作,正可看出诗人创作的别具匠心。

读这三部曲,可以看到,诗人的创作已经实现了对两次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逻辑的表达。这样的鸿篇巨制,需要对历史的参悟,对革命的理解,对诗歌创作技艺的娴熟掌握。放眼今日之诗坛,对郭小川留下的这一份遗产,我认为我们承继得还是太少了。

在我看来,当代诗歌有一种虚空高蹈、好高骛远的倾向。特别是,在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史这样关乎中华民族精神重要内容的创作上,少有作为,无甚建树。而这一创作内容,恰恰在表述历史的必然性与人性的丰富性方面,大有可为,到处是亟待开发的处女地。这是坚韧的大地,是史诗蕴藏着的大地。

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诗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更宽广、深刻地理解和表达我们的民族和民族的精神世界,如果我们丧失了这种理解和表达的能力,在创作上一味地跟着别人跑,也许凭借个人天赋,可以写出一些东西,但那很可能不属于中国文化。当然,依样画瓢的“四不像”,也很难写出属于世界的东西。我想借此机会明说的是:郭小川诗歌的遗产,还没有被我们真正继承。新的时代期待着新一代有担当的诗人去表达、去见证。

由中国作协主办的郭小川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于近日举办。

在“政治抒情诗”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诗歌潮流中,郭小川是一位代表性诗人。他对中国新诗的形式有着自己开创性的思索和实践,强调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独创性,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生苦短,经典永流传。诗人郭小川是幸福的,在他离世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读者记得他,热爱他,诵读他的诗歌。这说明他的诗歌赢得了持久的人心。而凡入人心者,必有回响,这似乎也是所有成功诗人最好的标志。

提起郭小川,我们自然就会想起郭沫若、闻一多、光未然、田间,想起贺敬之、艾青、白桦,想起他们那一代诗人闪光的名字和他们不朽的经典诗歌。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历史与中国共产党98年的光辉历程,一直都有他们热血激情的相伴;可以说,他们一直走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前沿。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建设祖国,还是保家卫国;无论是在广阔农村,还是在工矿哨卡,郭小川和他那一代诗人在行动与创作上,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以自己的诗歌为人民讴歌、为祖国礼赞。并且,他们始终坚定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激情,他们的诗歌以人民性为底线,向着更宽阔、辽远的方向前进。

该如何重新看待那一代诗人的作品

就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来看,今天的人们迎着八面来风,思想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人们不再迷信,不再僵化,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见解、想法和追求,都可能拿起笔来自由地书写自己内心深处体验到的、各不相同的诗意情怀。值得一提的是,恢复高考40多年间,人们对文学艺术、对诗歌的鉴赏水平,也都有了日益不俗的提高。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人拿起了诗笔,而且写得还真是像模像样。尤其在新诗的理论界,更是多元并举,众声喧嚣。

我想说的是——在这样一个各种信息汹涌如潮水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郭小川和郭小川那一代诗人的作品?会不会觉得他们已经不够新鲜、不够独特、不够厚重了呢?他们是被淘汰了呢,还是被遮蔽了?他们执著于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史的审美创作的发轫与开拓,是否得到了理论界和思想艺术界的关注?后来的诗人们又有多少承继与创新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驻足良久深入思考的问题。我想,值此纪念郭小川百年诞辰之际,也正是我们重温经典,重新发现与认识过往经典与过往诗歌大家精神价值的一个时机。

多元化不是虚无化。从哲学层面来说,多元并举,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主张和坚守。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多元越需要认识自己的来路与去向。历史与未来的中间是现实,历

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逻辑,是递进上升式的,弄明白历史,就是不忘初心。我们承继着上一代人的血脉,并且不准备以虚无的状态走向未来。相反,我们的确是到了需要认真地回顾与检视历史的时候了。昨天、今天与未来,永远都有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血脉,那是须臾不能中断的,事实上也无法中断。这就需要我们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中,去除泡沫与垃圾,找到那些包含着时代发展逻辑的、具有本质推动力的诗歌经典。因为这些经典构成了我们的来路,通着我们的老家,是我们新诗的族谱。我们不能数典忘祖,相反,我们一定要念祖省身,要以承继者的姿态,投入新的创造。而诗人郭小川及其创作的新诗作品,我以为就正是其中重要的经典之一。

共同撑起20世纪中国新诗的苍穹

20世纪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天翻地覆的时代,是中国革命肇始至建立新中国、



支书和老贫农 (中国画)

刘文西



至改革开放取得伟大胜利与巨大成就的100年。在这个100年间,诗人郭小川及其创作的诗歌作品,最少有40年是与时代紧紧相连、相伴、相互激励的。他的成就与业绩——对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史的审美创作和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审美创作,无论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说,他的作品都构成了时代精神的先锋。其精神的高度,与郭沫若、光未然、艾青、贺敬之等诗歌大家一起,共同撑起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苍穹。

仰望星空,我们说当代新诗的创作早已完成了浅表的抒写,进入了心灵的深处。诗歌的审美价值,不仅要见到人性的深度,还要以揭示历史的逻辑为圭臬,还要以对现实的表达、对人情感世界的宽阔与精微的阐释为标志。

今天,我就以这两个标准,来谈谈诗人郭小川和他的诗歌作品。我以为他不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他的经验对于我们后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诗歌创作揭示人性的深度、广度与精微度,彰显历史趋势的必然逻辑和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深度、广度与表达的力度,都具有可资借鉴与指引的精神价值和意义。他的很多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功经验与闪烁出的智慧,对我们后人有着重要的启迪。

两名女性在一起回忆其中一人的热恋对象,男主因在战争中胆怯、恐惧、无法逃避而精神失常,最后跳崖自尽……面对这种极端个例,诗人不仅没有忽视,而是更加关注其情感的流变与人性的陌生境界。循着诗人的笔触,我们可以随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情境。一边是钢铁战士,一边是懦弱书生,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展现,既有对革命战士英勇无畏的赞美,又有战争的种种残酷与恐怖带给人的精神压力与心灵的戕害。郭小川的书写,不能不让人对战争进行深层次的人性的思索。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郭小川与众不同的洞察、发现与创作的禀赋和能力,他求异求新的创作心理与创作思维,他对历史细节见微知著的阐发与把握的能力,等等,在我看来,这给后人在对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史的审美创作上,提供了承继与发扬的重要范例。

还有郭小川那首著名的被改编成电影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也是一部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史的卓越作品。这首诗歌表现出一种不一样的革命者形象,其所触及的人性的深度与广度,都超出了以往的同主题作品。可以说,郭小川开启革命战争文学丰富人性内容的一系列作品,为后续的时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并打开了创造的空间。

然而,我们对郭小川创作成就的认识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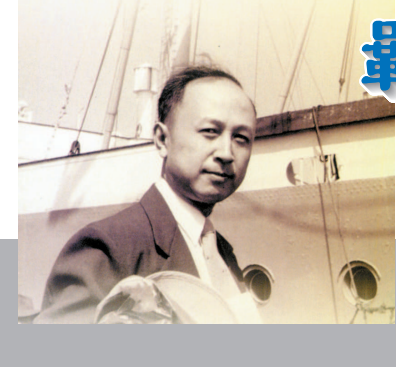
一张处方引起的风波

回国前,钱学森从父亲那里收到一个处方,希望钱学森在回国前能从美国为他的胃病拿点药。钱学森带着这个处方到地方药房买药,遭到拒绝,他们告诉钱学森,由于处方是从中国寄来的,并且是以中文的形式书写的,这个处方需要得到当地美国医生的确认。

当时钱学森想到了以前给蒋英治病的医生——查尔斯·波斯纳(Charles Posner)博士。波斯纳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内分泌专家。9月12日,钱学森首先给波斯纳办公室打电话。经同意后,他随即赶到波斯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北哈德逊大街99号的办公室。钱学森紧紧抓住那个塞满东西的公文包来到波斯纳的办公室。钱学森进门时说话声音很响,波斯纳无意间听到,立即赶出来,邀请钱学森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们商谈了15分钟。波斯纳博士为钱学森确认了那个处方。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麻醉药,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此后不久,钱学森拿着他的公文包离开了波斯纳的办公室。钱学森的这次访问纯属医学问题的专门访问,却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觉与怀疑,特别是在钱学森访问后的两三天时间里,波斯纳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不安以及烦躁情绪更引起了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疑虑。他们联想到钱学森将要回国的事实,认为钱学森和波斯纳进行了针对美国安全的阴谋活动。

于是,他们对波斯纳的档案进行了现场查看。1955年9月14日,联邦调查局人员伯纳德·W·麦卡锡(Bernald W. Macarthy)检查了洛杉矶的选民登记记录,上面记录了波斯纳的具体信息。



羁绊与归来

钱学森的回国历程

张现民 著

为了切实了解钱学森这次访问的动机,彻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联邦调查局兵分两路分别对波斯纳和钱学森进行问话。1955年9月16日,威廉·C·卡彭特(William G. Carpenter)和弗朗西斯·D·库利(Francis D. Cooley)在波斯纳位于加州帕萨迪纳北哈德逊街大街99号的办公室会晤了查尔斯·波斯纳。

波斯纳博士说,在1955年9月16日前一周,钱学森来到他位于加州帕萨迪纳北哈德逊大街99号的办公室进行一次专业访问。钱学森说,他从父亲那里收到了一个处方。波斯纳仔细看了处方,发现除了单词“Testosterone”外都是用中文写的。很明显,钱学森过去到过其他地方的药房,他们希望在拿药前有一个内科医生批准、认可这样一个处方。基于这样一个目的,钱学森拜访了波斯纳。考虑到这是一个普通的麻醉药,而不是一个有害或有毒的麻醉药,波斯纳博士为钱学森确认了处方。波斯纳博士说,他可能在以前某个场合见过钱学森,因为自从1954年5月,他经常给蒋英治病。蒋英患有支气管炎,主要是烟雾所致。波斯纳回忆说,有一次他访问过钱学森的家,也就是在那次访问中遇见钱学森,但是,从严

格意义上讲,那只是一个专业上的拜访,对钱学森本人则没有任何情况的了解。

就在联邦调查局人员会见波斯纳的同一天,也就是1955年9月16日,威廉·J·圣考利(William J. McCauley)和罗杰·S·C·沃尔科特(Roger S.C. Wolcott)在洛杉矶西六街512号附近地区会见了钱学森。沃尔科特在其报告中这样说,虽然起初钱学森有点担心,但整个会见,钱学森还是保持了比较配合的态度。

钱学森说,他于1955年9月12日上午11:15到11:30在波斯纳博士的办公室,让其确认处方,他希望在他离开美国前能在这个地区的药房买到父亲寄来的处方里写的药。他说,那个处方是由中国医生开的,因此对他联系的药房来说不是很明白。由于在处方中有一个词语“Testosterone”是用英语写的,这足以让波斯纳能够辨认出这个处方。钱学森说,这个药是他父亲需要的激素混合物。

钱学森说,他认识波斯纳博士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了,不是社会交往,而仅仅是他妻子的内科医生。钱学森还回忆说,最初接触波斯纳是由马勃介绍的。钱学森说,在这个国家,他从来没有被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接近过,并联系向中国或

天下地名、景点叫五龙口的不知道有多少。有的是因为那座山有五条溪水汇流叫五龙口;有的说某山边江中有五条龙而命名……我想,每一个“五龙口”都会有不同的景观、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故事。

我去的五龙口在河南济源东北。此五龙口自唐代起便有名气,大文豪韩愈曾留《送李愿归盘谷序》之文,盘谷是五龙口的一个景区。五龙口景观简单,不过观猴、看山而已,却非常有特点,因为简单,游山、观猴就有了很多清趣。

或有看官问:“看猴应该上峨眉、下黄山,那里有泼猴山间捣蛋,索讨食物,有攀树猴耍,山间拾趣令人捧腹,观猴又何必去五龙口?”

我扶栏答曰:“客或有所不知,此处猕猴为印度迁徙而来的一支,只只都是双眼皮、大眼睛,颜值高,且又聪明,会看山水,智商比3岁小孩有过之无不及。此群猕猴刚来时仅百余只,猴地生疏,缺食少喝,几乎已到濒临灭绝边缘。好在景区请来养猴、驯猴专家匡氏父子,在他们的精心调理、全面养护下,目前山上已经繁衍三四千只,分成好几个群落。这些猴子有猴性、顽皮、捣蛋,会抢游客手中食物,能打开饮料瓶一饮而尽,还会剥花生、糖果,模仿力很强。匡师傅驯养的猕猴懂人话,非常有看点,当然只听匡师傅的吆喝。匡师傅一声叫唤,山上一个群落的猴子便鱼贯而来,猴王摇摇摆摆居其中,左右环视,大有独霸山头之势态。然它对匡师傅言听计从,让其坐不敢爬,让其上不敢下,在它的带动下,群猴做各种表演,煞是好看。此处观猴可得,人毕竟高动物一筹,终有办法制服。”客闻之若有所思,点头称道。

又有不解曰:“若以游山论,或山岩森然峻险、怪石嶙峋奇峭,或杜鹃百里似锦,林木葱郁,九州名山可圈可点。不明白看山为何要选五龙口?”

余曰:“客官可知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和他的《匡庐图》否?荆浩者,河南济源人氏,隐居太行,一生只为笔墨丹青,其雄峻气格,别号洪谷子也;五龙口者,山体雄阔,山脉纹裂皱若斧劈,中条山主峰两侧峭崖石纹之线条似披麻,山间有沟壑飞瀑、古松怪石之雄姿,山岩氤氲缭绕,又像是墨色泼开一般。竖在五龙口的大山云生列岫,荆浩把它们与水墨墨章浑然一体;而溪泉坡岸,高深回环,得大山堂堂之气势,开写生之先河也。在五龙口看山,意义别样。”客亦觉得有道理,信服也。

何山无有峰峦、崖岩、石纹、裂皱?然荆浩于五龙口开写生之先河,足以流连观赏也。海拔1000多米高耸入云之山峰,便是荆浩《匡庐图》所绘的远山。

五龙口山崖气势雄浑、乔木杂植,又若咫尺而得纸上千顷之势。荆浩放眼广阔,偃截巨流,披苔裂石,遍而赏之,随即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换句话说,荆浩画的《匡庐图》是对着这里的大山大水写生的。一直以为中国画山水全是凭想象而画,而当我站在五龙口看那座大山后,才知道,原来中国人的山水是从自然中写生而来的。《匡庐图》写生处的发现,佐证了中国人也是注重写生的,并且比西方早了好多年。

如果来个场景再现:荆浩在此驻足停留,远望群山,提笔把大山的造型、脉络的变化起伏、植被覆盖的疏密、山路的崎岖等都画在了纸上,成就了一幅传世千山的山水画。

我想起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小城,当年凡·高在那里写生的吊桥、黄色砖墙的咖啡馆,以及他住过的疗养院,还有瓦兹河畔欧维的那座教堂等等,那些景物如今完好,只不过原来的树长高了许多,那些凡·高曾经写生过的地方,现在都插着牌子,上面印了他的那张画,并写上“凡·高写生处”。

我忽而又想,五龙口进山的那个路边,是不是也应该插一块牌子,印《匡庐图》于上,并书“荆浩写生处”五个字。

其他国家提供美国国防和安全问题的任何资料。他还说,他也不知道就这个方面有其他同事被联系过。

经过联邦调查人员的访问,他们明白:无论钱学森还是波斯纳,他们说的都得到了相互证实,也表明了钱学森确实是为父亲确认药方来找波斯纳的,他只是希望在准备拿药之前需要一位美国内科医生对这份来自中国的处方进行确认。就是这个目的,钱学森拜访了波斯纳博士。这才消除了联邦调查人员压在心头的疑虑。钱学森在得知可以回国的通知后,很快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辞去学校工作、订船票、行李托运,还与导师辞别以及为父亲拿药,同时钱学森还结清了所有在美国工作应该交纳的税费,翘首以待那个期盼了很多年的归国之日。

经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和难以言状的苦闷等待,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钱学森一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从钱学森1935年9月踏上美国国土,到1955年9月离开这块土地,钱学森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时间,钱学森在美国20年的生活经历,也是钱学森对美国的态度从爱到恨的过程。

钱学森说:“从1950年到1955年回国的这一段时间里,我除了教书和作一些研究工作以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得很少,而同时因为特务四周虎视,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有时间也有需要对美国的政治,以及世界形势作些思考和分析。”

但他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在1950年至1955年期间,美国政府整我的时候,就有许多美国朋友安慰我,千方百计地给我解决困难,对我表示了真正的友情。”钱学森还说,他认识到了他是环境的牺牲品。他宣称,他从来不让他的逆境来转变他对这些人的友谊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

(二十五)

连 载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